

## 編後語

無論現代性本身如何具有多元性，也無論現代性的來源如何具有多樣性，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始終與如何對待傳統的問題糾纏不清。自然，不同的社會勢力對於如何對待哪些傳統以達致其當下的一些目標，有着各自不同的盤算。其中，對於社會經濟政治生活最具有影響力的社會勢力，無疑是執政精英以及依附於（無論主動還是被動）他們的知識精英。他們對於傳統的重新建構，以「國學熱」的形式，對於當今中國官場與民間民族主義（尤其是非憲政民族主義或非自由民族主義）的興起，有着直接的推動作用。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發了雷頤的文章，從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視角，對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進行了系統性的記載和反思。眾所周知，儘管毛澤東對中國傳統中的帝王之學和辯證法爛熟於心，但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所謂的「國學」一向持批評的立場。在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中，「國學」長期以來一直是「封建糟粕」的核心內容，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被掃除的對象。然而，「國學熱」自1990年代中期赫然興起，一直綿延至今。關於「國學」的各種研究、宣講、禮拜，從民間進入了廟堂。對於這一現象，雷頤指出，隨着官方意識形態愈發無力就當今世界和中國的大變革給出合理性的說明，執政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訴諸民族主義的轉型和再造也就勢所必然；同時，知識界也自有諸多努力，力圖將「國學」中的各類傳統與歷史背景「脫嵌」，使之能與當今的政治經濟社會需要相契合。其實，在雷頤之文的所論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國學熱」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起中國出版業的半壁江山，這可以從「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個大背景下得到解釋：凡是政府主導的產業，都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得到迅猛的、同時也是畸形的發展。

巧合的是，本期的「學術論文」欄目還刊發了多篇文章，探討了與民族主義相關的一些問題。周陸洋詳細分析了《人民日報》對「愛國主義」的宣傳如何經歷了三個時期的轉變：從一種既無清晰內容又無系統灌輸機制的政治標籤，經過內容清晰但缺乏具體灌輸機制的宏大理論，轉變為內容清晰且灌輸制度充分例行化的意識形態工程。儘管論題有很大的差異，但這篇文章的內容與雷頤之文頗有呼應之勢。

論及民族主義，就不免涉及到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的問題。然而，正是在政治經濟逐步走向自由開放的進程中，若干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興起的「民族問題」赫然成為影響到中國未來發展的重大問題之一。姚新勇剖析了中國知識界反思民族政策的思想瓶頸，即缺乏對民族問題去政治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族群文化多元化和公民認同普遍化的共識。任崇彬梳理了聯邦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直擊近百年來中國知識界對聯邦主義的錯誤理解。在聯邦主義的制度框架中，統治性權力的集中不但保證國家的統一穩定，而且也是現代國家建設的基本要求；而行政性權力的分散則使社會和公民保持了活力。